

略論民主對家庭關係之影響

吳自鈺

民主自由和科學技術是國家現代化的要件，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，引致社會變遷對家庭所產生的影響斑斑可考。而民主以及由機械所驅使的另一面——社會化——對家庭所產生重大的影響則較易忽視。我國自清末而五四所要求的民主與科學在原則上本無可厚非，但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倡者的精神，亦只由清末消極批評轉為消極的否定，而其浪漫的幻想却已轉為理智的虛無，唯其根本仍是清代精神的延續，因此國人對民主科學的希求也僅一味着眼於實用或功利的觀點，并未能把握西方民主、科學的真精神，尤其是西方民主、科學、自由主義、社會主義的根本精神，多植基於人文主義、理性主義、理想主義及宗教精神之中，五四的流風轉而對我國傳統文化攻擊，并針對倫理道德和婚姻家庭加以否定，淺薄狂妄，害人害己，而今我人痛定思痛，再觀察民主在西方對家庭的影響，自能使我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減少家庭適應的阻力。

自工業革命後，西方家庭成員彼此逐漸處於新的地位，往日父子間相隔的距離亦為之縮減，至十九世紀初，所謂父權早經消失，尤其是美國，類乎羅馬及貴族政治意義下的家庭，幾乎從未曾存在，僅有當幼兒初生的一兩年，也許為父者恒有絕對無上的權威，而這種父權出現的原因，實乃由於嬰兒太幼小之故，但隨着孩子成長，他們對父親所具有的那種親屬性的服從亦日漸鬆弛，他是其自己思想的主人，並且很快的亦成為其自己行為的主人，實在說來，美國人幾無所謂青春期，其在兒童階段結束時，他即開始以成人的姿態出現并尋求其自己的道路。假若我人將上述父權解消的事實，認為是經過一種家庭革命，在革命中做子女者為要求自由而竟使用非道德的手段，如我國五四前後的某些家庭鬧劇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。蓋同一習俗和原則，使人肯定其獨立性，亦使其給予他人以獨立，而人所要求獨立的權利是不可抗拒的，為父者既已察覺家長權威的限度，則等待時機成熟，無須革命或鬪爭就自行投降。為子女者對於他們能夠自立的限度十分了然，時機一到他們即成為自己的主人。換言之，在正常的發展中，只要在適當的時間內，他們即可以獲得渠等作為一個成人的各種自由，而無需再作特別的努力了。

西方貴族政治的社會中，作父親的不僅是一家之主，而且還是

家庭傳統中的宗教、習俗的詮釋者，和子女行為優劣與否的仲裁人。當家庭成員和他交談時，必恭而敬之，因他一家長在家庭中有無上的權威而使人感受恐懼。惟當社會逐漸轉向民主時，父權對於子女的威力，由絕對信仰而變為僅供參考而已。此時所謂父權實由民主政治的進展已日漸消失。

在民族社會中，家產的再分割或許是改變父子關係的主要因素之一，當家產有限，父子則必然要同居操業，每天面面相對，家庭上下因而益形熟悉和親密，父權必然減少其絕對性，并且發展為一可商榷的外在形式。在民主社會裡中產階級和具有少數財產者，實足以推動民主政治的進展，同時由於貴族權力旁落，昔日父權乃為之消失，蓋風俗法律既趨民主，父子之間信心和親密勢必增加，再者，當社會距離逐漸縮短，社會軌範逐漸拆除後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也必將增進親密與和諧，在民主的家庭中，所行使的父權，限於提供經驗，以指導其家庭成員的生活，此外無其他權力，父親的命令或指導，在家庭中或將遭受拒絕而不服從，惟其所提的忠告却是有權威性的；民主社會中傳統的父權儘已泰半消失，然子女對父親的信心則仍常在的，父子間的顧慮消除，為入子者大可將問題、疑難向父親提出而進行權商討教，父權固然解除，但父親却依然是父親。

在往昔貴族社會父子之間猶如統治與被統治者的關係，自由和親密的情調，坦誠和無忌的氣氛，則較難於形成；父子之間的距離，也不易接近而趨疏遠。正因如此，傳統社會的家庭，亦如貴族社會，其名份乃預先標定而極為嚴格，為父者在家庭中既處特殊的地位，乃享極大的特權，反之子女則處於不平等的地位，其中年齡和性別亦為條件之一——決定其不變的地位，并涉及其特權的大小。

貴族的家庭長子恒繼承家產和其他特權，并將是父權的接替者而逐漸成為其兄弟姊妹的主人翁。由於長子繼承制，每使長子益能努力積蓄財產和擷取權力和地位，以求光耀門楣，家庭中諸分子往往因而團結以赴，分享利益和光榮。但在民主社會中兄弟姊妹的結合，其途徑、方式與前者迥然有別，在民主的法律之下，子女一律平等，相互獨立，渠等之團結，并非任何利誘或強制力量，實乃基於幼小時親密的兄弟之誼，和自然而和諧的社會接觸，以及自由的

意見和興趣之相投，民主固能分裂他們的遺產，但却使渠等心意一致，這決非貴族家庭之長子繼承所能媲美的。

以上所敘，涉及人性自然流露的感情，人類思想或感情模式隨生活條件而變化，法律能將父子或家庭成員糾合，然而當法律效用消失，渠等仍將分離，正如貴族社會以及封建社會主奴、父子關係之嚴格和緊密，然而隨着民主社會的形成，人與人的關係也就爲之改變，蓋法律絕不足以維護人類感情，唯有在自由的狀態下，情感方克自然發展，在此，民主實有無比的威力，民主將封建貴族傳統的社會紐帶放鬆，然却又加強若干合於人性和自然的紐帶，當社會各分子名位漸獲獨立自主，家庭親屬之間的關係自能調適得更形親密，民主社會并非無需法律與道德以維繫家庭關係，反之，也惟有在真正民主社會之中，社會道德基礎方愈爲鞏固。

民主自由對家庭關係的影響略如上述，現代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，家庭關係所受的影響問題，如家庭生活的改變方面，需要竭力尋求相當的家庭工作器械，以代替人的力役，蓋工業化的社會人工昂貴，中產家庭即較難僱傭工，必須設法以機械代替人力，（如汽車、冰箱、電話、洗衣機、吸塵器等多達三數十種），尤以在美國須能操作各種家事者，方克免受高度工資的威脅，如必要有人工相助，或不願爲家務所累，則須付絕大代價以求之。因此機器對於現代家庭的影響日形重要，相對的，近代婦女的地位提高，亦受益於機器，家庭使用機械，使主婦多有閒暇，得參加社會活動則爲事實，這無形中促使女權的提高，對婦女運動產生良好的影響。

但因科學技術文明過於發達，強大有力的機器，反使個人的聰明才智縮減，由於社會力量的轉變，使個性難以與之爭衡，一向負有培育個性使命的家庭，亦日形縮減其地位。強調社會效能和社會化者，視家庭爲一大水閘，或將關閉社會的長流之水，使其停滯而不與他人交流，亦不復視家庭爲人生教育的主要機構，而另謀其他機關——如學校、教會、圖書館、大眾傳播事業等爲之代替，此類機構在在足以潛移默化人心而影響家庭的地位和存在。於是社會化程度愈高，家庭愈不復受重視，家庭則既不成爲家庭分子工作疲勞休息慰藉的庇陰之地，亦不以爲沈思研究及子弟教育之所。換言之在極端社會化的國家，家庭似已成爲一種障碍物，介於個人與社會之

間的家庭，竟被認爲已無必要。然而一旦放棄個性的自由，確認社會的權威，甘願受制於純技術的機械生活，社會與個人是否能和諧與融洽，已成爲今日我人面臨的重大問題，社會化與家庭的對立，斷非人類的幸福之路，有人主張以廢棄保育個性的家庭，回歸自然，強調其自然主義；共產黨徒更以廢除家庭，妄想以「人民公社」替代家庭生活，這正足以構成對人類的生命自由和家庭安全的最大威脅，因此我人對當代西方文化的表層文明——一切物化、技術化、或曰社會化，於家庭所產生的影響，如何相應和調適，乃係社會學家、倫理學家的當急之務。